



伍家台春茶香

文 猛

地名承载着很多事情。湖北宣恩有一条河,叫贡水河,最近特别火,因为河上长长的龙船,因为飞溅的铁花,因为满城飘香的烤鱼。一条河取名贡水河,这个“贡”字,多半与当年的皇家有关,贡水河奔流不息,河上运送的贡茶、贡米、金丝楠木等物品,循着水波缓缓而行,最终从这条河运达京城。

宣恩贡水河最早的名字叫忠建河,因伍家台贡茶等贡品经此河漕运进京,这条河后改名叫贡水河。

我是奔着宣恩伍家台贡茶而来,一片绿叶的传奇,从乾隆年间飘香至今。

无法尽数记录宣恩那漫山遍野的24万亩茶园,我便走向宣恩县万家乡伍家台茶山。

这里有“伍家台贡茶先祖”的塑像。这里是中国贡茶第一寨。

这里是宣恩茶香最先飘起的地方。

伍家台贡茶先祖,便是贡茶首倡者伍昌臣(1757-1827)。伍昌臣的祖籍是湖南长沙,跟随祖辈迁居宣恩。乾隆四十年(1775),伍昌臣在忠堡屋脊垦荒时发现野生茶树,经数年培育制成“味甘汤高,板栗香浓”的茶叶,即便放到次年,其品质仍能保持色香味如初。乾隆四十九年(1784),宣恩知县刘树遴选出伍家台茶,经过施南知府迁毓等官员逐级进献,最后送达宫廷。

我想象着那个春日,乾隆皇帝轻啜了一口来自武陵山深处的茶汤,那时他该是怎样的神情。那“皇恩宠锡”的金字牌匾,照亮了伍家简陋的茶室,照亮了这片土地往后两百多年的命运。“甲子翠绿留丑丑,贡茶一杯香满堂。”匾额会褪色,皇朝会更迭,唯有这一片绿叶的滋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唇齿间流转。

沿着茶园之间铺设的木栈道拾级而上,走向雾中的伍家台,走向茶山山腰处的隆恩亭。亭中有一座石碑,一面是乾隆帝的画像及伍家台贡茶的刻字简介,另一面是乾隆帝的御笔题字“皇恩宠锡”。很多人看到乾隆帝御笔题写的“皇恩宠锡”四个字,都会把这个“锡”字误读为“赐”。查找资料,知道“宠锡”就是“帝王的恩赐”的意思,常用于记载帝王对重臣的封赏,是帝王的专用词。这是伍家台的荣耀,伍昌臣在伍家台搭起了盛大的茶台,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和它的茶香声名远播。

宣恩人戏说,还是乾隆帝看得远,当年他御赐“宠锡”,说得真准,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宣恩的土地富含硒,含硒的茶

特别受人喜欢。我们都知道“锡”不是“硒”,但是人们喜欢这样的戏说。

在木栈道向上的台阶上,读到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标语,这也是一路“新茶”——

茶有韵味,心无界;你用心,我用心;清雅知心,御叶知人;廉洁人品磨砺出,壮烈人生干中来;君子之交淡如水,茶人之交醇如茶;品上家贡茶,思人生清廉……

走向茶垄,茶香扑面而来,花香扑面而来,鸟鸣扑面而来。这是春茶的季节,茶山在云雾里,茶垄依山势起伏,像大地的五线谱,那些背着竹篓的采茶人,便是这乐谱上跳动的音符。走过伍家台,那些茶山就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的“桌面”。

伍家台茶山养眼,也养心。

这里的绿是有重量的。新芽的嫩绿压在老叶的墨绿上,今年的翠绿叠着去年的苍绿。茶树沿着山势铺展,不是整齐的田垄,而是顺着大地的呼吸起伏,这是向上的脉络。采茶人的身影在茶室间若隐若现,他们的动作与山风的节奏合拍,与云雾的流转同步。

这里的风是可以看见的,这里的风是可以闻到的,这里的风是可以带走的,风中的茶香从土地深处渗出来,带着泥土的沉稳、山泉的清冽,在春光中静静流淌。

对一个地方是否印象深刻,我个人通常用两个标准,一是酒,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地方山水风物、风土人情的浓缩和升华。一个城市一个村落,没有自己土地上的美酒,城市和村落似乎就少了点儿豪气。

二是茶,茶作为土地最精神层面的植物,阳光照过,雨露润过,歌声飘过,没有自己土地上的茶树,这片土地可能就少了一些灵气和生气,喝着土地上的清茶,那方土地那方田园那方炊烟就融入心中,永远割舍不去。

伍家台有酒,伍家台酒。伍家台也有茶,伍家台贡茶。

这里是生长贡茶的山,这里也是铺开的美景:茶花谷,贡茶广场,贡茶山,龙洞湖,昌臣故里,浪漫茶海,三泡泉,虎突泉,涌天香……一个生长茶叶和庄稼的山寨也生长风景。

在茶山的最高处,我遇见了一位正在采茶的土家阿婆。她的背微驼,手指却灵巧得像在茶尖上跳舞。“采茶要掐这个指尖,”她操着浓重的乡音对我说,“像这样,一芽一叶,不能多,也不能少。”阳光透过茶树的间隙,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阿婆说她嫁到伍家台六十年了,见证了这片茶园从荒芜到繁盛的全过程。“这茶树啊,懂人心性的。你善待它,它就用最好的茶来回报你。”采摘的茶叶在竹篓里静静呼吸,它们即将开始另一

段旅程——从山野到茶碗,从枝头到心头。

阿婆唱起了采茶歌,歌声响起,茶山上采茶的人都跟着唱起来——

鄂西宣恩有贡茶,茶叶之宝甲天下。当年捧茶献天子,皇恩宠锡传佳话。如今茶香飘四海,色香味浓谁不夸。远方的朋友亲爱的客,请喝一杯宣恩茶。

她的竹篓里,是渐渐堆积的嫩绿的茶芽,她的脸上,是歌声激荡而出的笑容。远处,她的孙儿正在新修的七彩茶道上奔跑,笑声惊起了林间的鸟雀。村庄有很多美丽的茶道:隆恩茶道,云中茶道,天香茶道,茶马茶道,茶道上络绎不绝的游客和采茶人。

午后,我走进山腰处的一户农家家里。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白墙灰瓦,门前晒着茶叶,院里停着新买的轿车。女主人田嫂正在院子里拣茶,见我来访,热情地泡上刚炒出的明前茶。“以前哪敢想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哟,”她一边斟茶一边说,“记得我刚嫁过来时,家里还是土坯房,下雨天屋里都要打伞。”

她告诉我,自从伍家台发展茶旅融合后,她家不仅翻新了房子,还开起了农家乐。“春天和秋天采茶季,游客多得接待不过来。光是卖茶叶,一年就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说这些话时,她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一种对生活心满意足的光亮。她的丈夫正在后院调试茶叶揉捻机,机器的嗡嗡声与山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支乡村振兴的协奏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一方茶养一方人。在伍家台,在宣恩,我们说茶,我们也是在说人。

傍晚时分,我随村里的老茶师伍万年参观他的手工茶坊。73岁的伍师傅精神矍铄,炒茶的手依然“稳如磐石”。他的手掌在滚烫的锅里翻飞,茶叶在掌心与锅底之间涅槃重生。

“炒茶要用心听。”

“听茶叶说话,听火候说话。”

“机器茶固然好,但手工茶有灵气。”

伍师傅边说边在烧热的铁锅里翻炒着茶叶,手法轻巧娴熟,像在抚慰初生的婴儿。茶香随着他的动作在屋内弥漫,那是混合着青草和阳光的香气。

“我18岁开始学炒茶,这门手艺养大了三个孩子,供他们上了大学。”伍师傅不无自豪地说。

如今,他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伍家台,用电商平台把家里的茶叶卖到全国各地。

“以前是我们背着茶叶出山卖,现在在全国各地的订单飞进来。时代变了,但茶还是那个茶。全村种茶4500多亩,还是不够卖。这个幸福的时代,我们赶上啦!”

天空是蓝的,茶山是绿的,风是清的,天上星星亮起,茶山上灯光渐明。茶厂的灯火次第亮起,像大地上长出的星星。现代生产线的运转声与手工炒茶的沙沙声此起彼伏,共同守护着这片水土的呼吸。

晚风送来阵阵茶香,我想起白天阿婆说的话:“我们伍家台人啊,是泡在茶里长大的。”

一方水土,用一片绿叶养活了几代代;一方人,用一双巧手将这片绿叶化作天下香。

正月十六的夜,是被一盏盏灯点亮的。暮色渐渐浸染京杭大运河运河畔的天空,千年古镇杨柳青,便在这片流光溢彩中缓缓苏醒。青砖黛瓦的轮廓,被一串串、一簇簇暖光重新勾勒;静立运河边的年画娃娃,在灯火映照下仿佛真的要从中走出来,憨态可掬地迎接着摩肩接踵的游人。空气里,浮动着的糖墩儿的甜香、人群的欢笑,还有一种沉淀了数百年的、独属于这里的年的味道。

这味道的核心,在杨柳青那一排排古朴典雅的方形灯笼里。它们高高悬挂,排成整齐的队列,不像别处的花灯那般争奇斗艳,却自有一种沉静雍容的气度。走近细看,灯上不是寻常的花鸟图案,而是一幅幅笔法细腻、情节连贯的国画——或是《三国演义》里“三英战吕布”的沙场豪情,或是《七侠五义》中义士们飞檐走壁的江湖传奇。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杨柳青年画灯笼,已在运河畔传承了几百年。旧时,杨柳青每条街几乎都有小说年画灯笼,周围十几个县的百姓赶来,就为从这“有看头”的灯下走过。

今夜,人群又如潮水般涌来。男女老少,携家带口,仰着头,边看边念着画片上的故事,缓缓从灯下穿过。这是杨柳青传承已久的“遛百病”。人们相信,正月十六这天,从这些年画灯笼下走过,便能将一年的疾病与晦气“遛”走,祈求新年安康。

笑声灯影里的杨柳青

杨柳



在温情的现代夜晚,依然保有它朴素而强大的生命力。一个被父亲扛在肩上的小男孩,指着灯笼上的关羽,奶声奶气地问:“爸爸,这个红脸的爷爷为什么在灯上?”父亲笑着,一段“千里走单骑”的故事便随着灯光,流进了孩子清澈的眼眸里。文化,就这样在一盏灯、一句话间,完成了它最自然的传递。

灯影里传来锣鼓声,东篱法鼓老会会起了。陈会长和他的老伙计们敲起那套乾隆年间传下的鼓点,铿锵清脆,鼓声雄浑。年画灯笼下,人们不约而同让出空地,又舍不得走远,就围成个圈。鼓点越来越急,像运河解冻时的冰裂声;忽然又缓下来,潺潺的,如御河春水。

远处传来欢快的笑声。在剪纸传习室里教孩子剪骏马的老艺人,在年画坊里为孩子们演示勾勒点染技艺的年轻传承人,那些在文创市集上展示书法、绘画技艺的艺人,他们自己就是这古镇文脉上最鲜活、最坚韧的一盏灯。

如果说年画灯笼诉说着历史的厚度,那么古镇的主会场,则铺开了一幅科技与艺术交融的现代“立体年画”。以“年画映新灯舞西青”为主题的第29届灯展,将古镇变成了一个梦幻的光影剧场。四十余组大型灯组,已不仅仅是静态的观赏物。《门神新像》灯组,将传统门神的威武神韵与未来科技感相结合,化身身披光影铠甲、目光如炬的巨型机甲,灯光流转间,古老信仰被赋予了震撼的现代气场。《漕运盛景》灯组,则用动态的光影和宏大的场景,重现了当年运河上十帆竞发、人声鼎沸的繁华,让人仿佛听见了过去的漕船破浪之声。

更妙的体验是“人在画中游”。一场名为《寻找白俊英》的沉浸式体验剧正在街巷间上演。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手持线索,从石家大院出发,穿过如意大街,在关帝庙的戏楼前,成为剧情的一部分。那位传说中的年画才女白俊英的故事与赶大营的壮阔历史、运河的悠悠文化,乃至天津快板的诙谐,都被巧妙地编织进这条游览路线里。一位游客感慨:“只有沉浸其中才明白,正是像白俊英这样一代代年画人的坚守与创新,才让年画和古镇的故事‘活’到了今天。”

夜渐深,运河水的波光里,摇曳着另一个璀璨的星空。那提着年画小灯笼的孩子,已在母亲怀中熟睡,梦里或许有骑赤兔马的将军;那对白发夫妇,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完“遛百病”的全程;而陈会长和他的伙伴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摘下灯笼,一如迎接它们时的庄重。这些灯笼将被妥善保存,等待来年再次被点亮。

千年文脉,如同这运河水,从未真正断绝。它从《莲年有余》的娃娃手中流过来,流过“三千货郎满天山”的“赶大营”壮举,流过清乾隆皇帝笔下“拂青青翠嫩嫩梢”的咏叹,如今,它流进了3D投影的光晕里,流进了无人机编队的程序里,更流进了一个个“90后”“00后”守护与创新的热忱里。元宵的灯火终将熄灭,但被这灯火照亮的脸庞、温暖的心房,连接起来的情感与被唤醒的文化记忆,却会在古镇的肌理中长久地沉淀下去,生生不息。

杨柳青,这幅“活”着的年画,正以它古老又青春的姿态,邀请每一个时代的人,欣然走入画中。

摄影:王祥

除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所著名高校的徽章外,天津其他高校数十年来发行的徽章亦是精彩纷呈,可圈可点。如建校六十多年的天津财经大学,有人搜集到其校徽和纪念章达五十余种。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发行的徽章种类也较多。小小的徽章见证了天津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培养出大量人才的过程。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天津高校徽章还真实地印证了天津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些重要环节和细节。

如果您在收藏市场遇到一枚长方形白底红字“中央音乐学院”的铜质校徽,您千万不要以为它不是天津的徽章而轻易放弃。中央音乐学院1949年成立于天津,校址即今河东区十一经路天津音乐学院。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开始迁往北京,曾在天津人民礼堂举行告别音乐会。学院留津的一批高水平师生就地组建了河北音乐学院,后更名为天津音乐学院。由于出现过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况和传承关系,前述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行的“中央音乐学院”铜质校徽,既是今中央音乐学院早期徽章,也是今天天津音乐学院早期徽章。

收藏市场还出现过“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白底红字和红底白字的一对方形金属校徽,系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行,该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此外,尚有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西北等地分支机构发行的毕业纪念章。这些徽章上的文字和图案可为新中国和天津音乐教育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实物细节。

河北大学徽章也是容易被天津徽章收藏者忽视的一类重要藏品。河北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初名天津工商大学,校址在今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场道校区。1923年预科开始招生,后改设附属中学(今天津市实验中学前身)。1925年工商大学主楼建成后正式招生,设工、商两科。1933年因学校所设院系未达“大学”标准,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至1948年时已设有三院十系,升格改称津沽大学。1952年天津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津沽大学工、商两科分别并入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同年9月,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的天津师范学院成立。1958年,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天津师范大学改建为综合性大学,定名为河北大学。古典文学专家顾颉刚、历史学家漆侠等,都曾在当时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任教。1970年,河北大学迁往河北省保定市,在天津马场道设河北大学留守处,原校址由天津外国语学院专科学(今天津外国语学院前身)使用。

河北大学一百余年的历史,除了教育功能外,还包含着工商、师范、学术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河北大学与天津现存高校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此外,天津两所著名中学实验中学、新华中学历史上都曾经是河北大学及其前身高校的附属中学,这也是天津教育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

现存一枚1952年发行的“天津师范速成班第二期毕业纪念章”,还有一枚1953年3月发行的“天津师范学院政治系纪念章”,皆为金属材料,图案既有书卷又有齿轮、麦穗,体现出时代色彩,反映了天津师范学院成立初期的真实信息。

我存有两枚图案几乎相同的天津实验中学校庆纪念大铜章,第一枚是建校65周年时发行的,标有“1930—1995”字样;第二枚是建校77周年时发行的,标有“1923—2000”字样。调整后的年份,显然是与该校最初作为天津工商大学附属中学的历史更为吻合。而纪念章上标记的“工商—津沽—实验”字样,既是对实验中学本身历史的纪念,也是对校名已经通入历史数十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的一种纪念。

题为1988年发行的天津音乐学院建校30周年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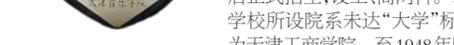


题为1988年发行的天津音乐学院建校30周年纪念章。

罗丹

桃李芬芳化雨中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二)



罗丹

上小学时,我把电影也看作“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在热河路小学上四五年级时,去滨江道新闻电影院当了小小义务服务员。由此,我开始走进五彩缤纷的电影世界。

上世纪50年代末,天津有两家新闻电影院,一个坐落在南市,就叫“南市新闻”;另一个位于滨江道辽宁路与新华路之间、全市最热闹的地方,是我心目中正宗的“新闻电影院”。周边光明、和平、天官、工人剧场、延安等影院林立,但新闻电影院以消息快捷、知识面广而独树一帜。

上午没课的时候,我会和同学们早早来到影院,跟师傅认真做卫生。有观众了,尤其是灯光初歇的初始几分钟,我们会打着手电筒帮助迟到者找座位,往来穿梭。

一会儿满场归于寂静,我们几个小学生服务员就各自找角落静静观影,汲取知识。

这个影院专门放映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虽不如故事片琳琅满目,情节曲折,但很像电影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满足了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强烈的求知欲。

那一年,正值国庆十周年大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举行,有两部文献纪录片至今令我难忘。

中国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征服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小小少年苏连雄记住了三位登顶的英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爷爷珍藏着一个旧皮箱,里面存放着一个褪了色的绿邮袋,边角磨得发亮,上面“乡邮”两个字用白线绣成,虽有些磨损,却依旧清晰。爷爷说,这邮袋是当年邮政所配发的,绿得像山间的青松,装过的不只是信件报刊,还有村里人半辈子的期盼与温情,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念想。

上世纪70年代,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乡邮员。那时的乡邮路,有翻不完的山梁,跨不完的溪流,三十多里路全靠双脚丈量。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背着沉甸甸的绿邮袋,踏着晨露上山,披着暮色回家,风雨无阻。那抹流动的绿色,成了山路上最显眼的风景,乡亲们远远望见,就知道是送信的师傅来了。

爷爷的绿邮袋里,总有两样固定的东西:一小罐红糖和一个针线包。他说山里老人孩子多,红糖能应急补力气,针线包能帮乡亲们缝补路上磨破的衣物。有一年深秋,山里下了早霜,爷爷路过核桃湾时,看见独居的陈奶奶正坐在门槛上发愁。原来陈奶奶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寄来的过冬棉被被老鼠咬了好几个洞,她眼睛花,根本缝不了。爷爷二话不说,坐在屋檐下,用针线包给棉被缝补起来。他的手常年握邮包,攀山路,布满老茧,却缝得又匀又密。缝完后,他又从绿邮袋里摸出红糖,冲了一碗热糖水兑给陈奶奶暖身子。陈奶奶拉着他的手,眼眶泛红:“大兄弟,你这绿邮袋里,装的都是暖人心的宝贝啊,比亲儿子还贴心啊。”

从那以后,爷爷的绿邮袋里又多了些“额外”的重量。陈奶奶的降压药快吃完了,他提前记在小本子上,进城时顺便买回来;村里孩子要寄成绩单给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他手把手教他们贴邮票、写地址;就连谁家的鸡丢了,猪跑了,也会托他在沿途打听。乡亲们总说,爷爷的绿邮袋是“百宝袋”,装着山里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那抹绿色走到哪儿,哪儿就有安心和暖意。

有一回,暴雨冲毁了山涧的木桥,邮路断了。爷爷站

在岸边,看着湍急的水流犯愁。村里的年轻人说要等水退了再走,可爷爷记得,王大爷的儿子寄来了救命汇款单,张婶的女儿寄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些都是乡亲们盼望月亮等着的东西。他咬咬牙,找了根粗壮的树干当独木桥,小心翼翼地挪了过去。走到河中央时,脚下一滑,爷爷摔在水里,他把绿邮袋紧紧护在怀里,生怕里面的信件被浸湿。上岸后,他不顾浑身湿透,先解开邮袋绳子检查,

见用塑料袋包着的信件裹得严实,完好无损,才松了一口气,拧了拧衣裤的水,继续赶路。那天,当他浑身泥泞、披着湿衣把汇款单和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亲们手上时,张婶拉着他的手,连声道歉:“您这绿邮袋里,装的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

爷爷的绿邮袋里,也藏着孩子们的希望。那时山里的学校条件简陋,图书少得可怜。爷爷每次进城送信,都会去书店搜罗一些旧书和画册,放进绿邮袋里带回山村。他把这些书分给学校的孩子们,看着他们围坐在一起,如饥似渴阅读的样子,爷爷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有个叫小石头的男孩,父母离异后跟着奶奶生活,性格孤僻。爷爷发现他特别喜欢看书,就经常给他带故事书,还在书页上写下“好好学习,走出大山看世界”这样鼓励的话。久而久之,小石头变得开朗起来,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后来小石头考上了师范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临走前,特意跑到爷爷家,恭恭敬敬地鞠了

躬:“爷爷,没有您绿邮袋里的那些书,就没有我的今天。您的绿邮袋,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光。”

岁月流转,爷爷的背渐渐驼了,脚步也变得蹒跚。随着乡村公路修通,快递车开进了山村,智能手机普及,人们渐渐不再依赖书信联系。爷爷退休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陈奶奶给他缝了双新布鞋,鞋底纳得厚实,说:“以后不用再走山路了,穿这鞋舒服。”王大爷拎来了一篮自家种的核桃,硬塞进爷爷怀里;小石头寄来了一幅亲手画的画,画里是一个背着绿邮袋的老人,行走在洒满阳光的山间小路上,那抹绿色格外鲜亮。

如今,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却总爱坐在门口,望着当年走乡邮路的方向。他常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交通方便了,通讯发达了,绿邮袋换成了快递车,但那份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不能丢。

去年秋天,小石头带着妻儿回村探亲,特意来看望爷爷。现在村里建了文化书屋,孩子们有读不完的书;村里还有了电商,乡亲们种的土特产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他拉着爷爷的手说:“爷爷,您当年的绿邮袋,现在换成了电商包裹,您传递的爱心和温暖,一直都在延续。”

爷爷笑着从旧皮箱里拿出那个绿邮袋,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递给小石头:“这邮袋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把这份暖一直传下去。”夕阳下,绿邮袋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鲜亮,就像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永远不会褪色。

董国宾

那时候,每部正片前加映的《新闻简报》,虽然看不太明白,却让少年们开阔了眼界。

令我兴趣盎然的是科教片中的体育单集教学片,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滑冰等,可以反复观看、仔细揣摩,让我对各项体育运动的规则、技战术了然于胸,曾自嘲是“样样精通,样样稀松”。

以游泳的蛙泳为例,在新闻电影院学完基本动作,到游泳池实践,牢记要诀:“划水蹬水分先后,动作迅猛节奏明。”虽没受过一天正规训练,但泳姿极标准,我的100米蛙泳成绩1分28秒,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

诸多进口短片的艺术性也培养了我的艺术素养。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苏联大型纪录片《莫斯科与莫斯科人》的内涵,但影片中镜头、色彩及画面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使我记忆犹新。

匈牙利讽刺短片《魔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科学家发明了一个谁坐上谁说实话,让人“袒露心扉”的魔椅,结果市长、市长夫人、官吏、诗人、恶仆等,逐个出丑。

匈牙利儿童片《小狗巴尔包斯》动感十足、欢快烂漫。《雪人邮递员》等东欧动画片极富想象力,是小朋友的良师益友。

时间久远,回忆六十多年前的事,难免挂一漏万,但我要说,在新闻电影院当小小义务服务员那两年,有助于我自己体育认知、审美情趣的提升,为我将来的体育记者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爷爷的绿邮袋

董国宾

董国宾